

前往東、西洋： 〈宇內形勢圖〉解析及其地緣政治想像*

陳宗仁**

摘要

近年學界在十九世紀文獻《蘭苕館外史》找到一幅輿圖，據載出自郁永河的《裨海紀遊》，此圖的出現引起一些問題，促使我們重新關注《裨海紀遊》的版本與文本內容，特別是郁永河除了描述來臺見聞之外，他對清初東亞海域世界的觀察角度與內容亦值得重視。

從文本內容與敘事結構來看，此一輿圖與《裨海紀遊》所附〈宇內形勢〉一文相關，且部分內容與《裨海紀遊》其他諸稿的文字雷同或概念相似，可以認為是郁永河同時代的作品，甚至是郁永河的作品，反映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地理知識與東亞海域形勢。

其次，此一輿圖與〈宇內形勢〉均沿襲明末的東、西洋地理知識架構，再寫入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新知識、新形勢，呈現了對臺灣、咬喇叭、呂宋、英圭黎等地的關注。其空間關係不是依循自然地理如潮流、季風、島群分布，亦非受限於交通技術條件，如遠近、險阻與否，而是顯現 1684 年（康熙 23）清朝開放海禁後，閩南海商的商業運作網絡以及他們對東亞海域的認識與關注。

關鍵詞：郁永河、《裨海紀遊》、宇內形勢圖、東西洋、東亞海域

* 本文曾以〈舊架構與新知識：再論郁永河的〈宇內形勢圖〉〉為題，發表於 2010 年 12 月 3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故宮博物院合辦之「清代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感謝論文與談者林天人教授給予寶貴意見；此次刊出，亦感謝兩位審查人的修改意見。此文之研究，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 98-2410-H-001-089-MY2）補助，前往中國國家圖書館閱讀相關文獻，並感謝中國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協尋、影印相關史料，以及助理陳志豪、劉育信、林哲安的協助。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2 年 4 月 23 日；通過刊登：2012 年 7 月 4 日。

- 一、前言
- 二、從版本角度的討論
- 三、圖像的分析：內容與主題
- 四、〈字內形勢〉的分析
- 五、圖與文呈現的年代、知識脈絡及地理想象
- 六、結論

一、前言

1697年（康熙36）¹福州府海防同知的幕僚郁永河來臺採硫，他與隨從自臺南到臺北，縱貫臺灣西半部，將沿途見聞寫成《裨海紀遊》一書，由於此書內容珍貴與豐富，自日治時代以來，即為臺灣學界重視。²此書最重要的研究者應屬方豪，他在1950年出版《合校足本裨海紀遊》（以下簡稱「合校足本」），1959年又重新編輯《裨海紀遊》，並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臺灣文獻叢刊」，此一版本多年來是學界引述《裨海紀遊》內容的主要依據。方豪自信搜集版本甚多，曾謂是合校「足」本，但是否是足本？在當時已被學者楊雲萍質疑。³

2010年5月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舉辦「第六屆文化交流史暨方豪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先驅、探索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廈門大學周翔鶴教授的論文〈從郁

¹ 本文採西元紀年行文，為幫助讀者了解當時實際統治的情形會加上中日紀年，惟自1945年後不加民國。

² 關於《裨海紀遊》的寫作背景、全書內容與結構，參見方豪，〈郁永河及其裨海紀遊〉，《大陸雜誌》1:6（1950年9月），頁12-17；郁永河著、許俊雅校釋，《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頁1-42，又此書附錄1990年以來有關《裨海紀遊》之論著；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³ 楊雲萍指出，方豪忽略了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徵引的郁永河文稿，參見楊雲萍，〈關於臺海使槎錄與裨海紀遊〉，《公論報》，1954年3月15日，第6版。方豪對此承認疏漏，但認為對合校足本無損，參見方豪，〈弁言〉，收於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44種，1959；1697年原刊），頁11。〔按：此一版本以下簡稱「文叢本」。〕

永河《裨海紀遊》宇內形勢圖說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⁴ 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即郁永河此書可能有地圖，而此事是學界未曾注意與討論的。

周翔鶴在安徽桐城人許奉恩《蘭苕館外史》卷九，讀到「擷錄海上紀略」一篇，其中除〈海吼〉、〈天妃神〉、〈木龍〉等多則「異聞、異見」外，亦有一則名為〈宇內形勢〉的文章，長約二千字；此外，收錄地圖一幅，亦是木刻板刷印，隔頁有說明文字：

里蔡子曰：右圖固摹郁君原本所繪者，海內外各處朗若列眉，梯航者觀之，亦可知所考焉。⁵

里蔡子乃作者許奉恩自稱，書中之圖並無題名，但謂摹自郁君原本。因此，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似乎附有一幅地圖，周文稱之為〈宇內形勢圖〉（以下行文暫稱為〈海域圖〉，參見附錄三）。

周翔鶴在《蘭苕館外史》中讀到此圖，遂寫作前述之文。由於該文尚未正式刊行，流傳不廣，茲引述其內容大要與卓見。全文除前言、結語外，分四節討論地圖的出處、地圖的由來、郁永河對世界地理知識狀況的探討、對〈宇內形勢〉的研究與引申。除了探討《蘭苕館外史》引述的版本依據之外，他認為郁永河性喜遊歷，亦因渡海來臺，故搜集了「世界地圖知識」，這主要由利瑪竇的地理知識與中國典籍裡的渾天說與陰陽家的大瀛海說組成。周教授並指出〈海域圖〉的內容主要有中國東部沿海與西南沿邊地理、海上交通知識；前者受明代海防圖，如茅元儀《武備志》、鄭若曾《籌海圖編》的影響，後者得自舟師。至於〈海域圖〉的繪圖習慣和特徵，他認為是一種「圖畫式的地圖」，其風格與《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類似。⁶

⁴ 周翔鶴，〈從郁永河《裨海紀遊》宇內形勢圖說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六屆文化交流史暨方豪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先驅、探索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5月15日。

⁵ 許叔平，《蘭苕館外史》（臺北：文海出版社，2003），卷9，頁41a。〔按：此一地圖置於同卷，頁40、41之間。又叔平乃許奉恩的字。〕本文引用舊籍時，其標點均為筆者所加，部分標點與現代校注本不同，以下不一一注明。

⁶ 周翔鶴，〈從郁永河《裨海紀遊》宇內形勢圖說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

該文已初步釐清一些問題，但〈海域圖〉僅見於道光年間《裨海紀遊》之趙達綸刻本（以下簡稱「趙達綸刻本」）引述，有孤證之嫌，筆者認為版本方面仍有一些問題值得討論；但更重要的是，關於〈海域圖〉此一文本，似應對其內容與風格作討論，以便探討以下問題：一、若不考慮郁永河與〈海域圖〉的關係，而純以地圖圖像分析，此圖表達的內容可能存在於什麼時代？二、承續前一問題，本圖內容的繪製手法究竟表達怎樣的歷史敘事或概念？亦即這張地圖是什麼樣性質的一幅圖？筆者認為〈海域圖〉與《裨海紀遊》所附〈宇內形勢〉一文相關，涉及明末「東、西洋」地理知識架構與清初海外地理知識的整合與呈現。

因此，拙文擬在周翔鶴的研究基礎上，針對上述問題，引用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進行討論。以下先探討筆者所見《裨海紀遊》版本及其與〈海域圖〉的關係。

二、從版本角度的討論

《裨海紀遊》一書是否有〈海域圖〉？據許奉恩所述，他是在趙達綸刻本的《裨海紀遊》見到〈海域圖〉，那麼在目前所知的其他刻本、抄本裡，是否有此圖或與此圖有關的訊息？由於〈海域圖〉與〈宇內形勢〉一文相關，在其他刻本、抄本中，如何刊載這兩件文本？這是本節討論的重點。以下先討論《蘭苕館外史》引述的版本。

許奉恩生於1816年（嘉慶21），卒於1878年（光緒4），為幕客終老，⁷其所著書《蘭苕館外史》，又稱《里乘》，初刻於1874年（同治13）。據其書〈說例〉載：「憶自癸卯秋試報罷……乃迄今三十餘年，所得僅此」，秋試報罷之癸卯年，當為1843年（道光23），至是書刊刻，約有三十一年；書中〈說例〉有一條謂：

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予每閱叢書秘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為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彙成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敢掠美也。⁸

⁷ 李偉實、許志燾，〈許奉恩家世及生平考略〉，《明清小說研究》1991: 4，頁247；李偉實、許志燾，〈許奉恩評傳〉，《明清小說研究》1999: 2，頁234。〔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⁸ 許叔平，《蘭苕館外史》，〈說例〉，頁2a-3b。

全書標出擷錄某書者，僅見於第九卷，擷錄之三部書中，即包含《裨海紀遊》，許奉恩謂：

曩在都中，見達君經圃所刊郁君滄浪《裨海紀遊》一書，係于役臺灣，按日筆記。後附〈海上紀略〉數則，所誌異聞、異見，並濱海各國人情風俗甚詳，意者亦有心人也，爰擷錄以公同好。郁君名永河，武林人，官閩省牧令。達君名綸，襄平人，仕隱未詳。⁹

文中提到「達君經圃所刊」，即趙達綸於 1835 年（道光 15）刊刻的《裨海紀遊》，此刻本收錄有〈海上紀略〉一篇，以下先將此篇與方豪的校本做比較，以見其異同。

方豪之合校足本，書名作《裨海紀遊》，分為兩卷，上卷起自郁永河自述入閩與抵臺，下卷寫採硫經過與離臺。附篇為首是〈番境補遺〉，接續有〈宇內形勢〉、〈海上紀略〉、〈偽鄭（鄭氏）逸事〉等篇。1959 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刊印的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即方豪編輯的《裨海紀遊》，刪去校注文字，分做三卷，合校足本下卷之採硫經過與離臺，析為卷中與卷下；另收錄四篇，與合校足本相同，但排序有異，先後為〈鄭氏逸事〉、〈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宇內形勢〉等。

許奉恩《蘭苕館外史》擷錄的〈海上紀略〉，與文叢本相較，其內容包含了文叢本的〈海上紀略〉、〈宇內形勢〉兩篇原文，但〈宇內形勢〉並未成篇，而是附入〈海上紀略〉中；另一個較大的差異是許書刊載一幅地圖。

《蘭苕館外史》與文叢本其實來自共同的祖本，即所謂的趙達綸刻本。方豪在文叢本的弁言中交代版本來源，謂係以「屑玉叢譚本」作為校勘的底本，他認為：

屑玉叢譚本既據達綸本，且錯誤最少，所以我向周憲文先生提供意見，即以屑玉叢譚本為底本，並以我的藏本供他翻印，仍由我參酌各本，為之校勘，但不加說明。援連雅堂先生例，改「偽鄭逸事」為「鄭氏逸事」。〈海上紀略〉末之〈宇內形勢〉，據他本另立一卷。¹⁰

換言之，方豪依據的屑玉叢譚本，〈宇內形勢〉並未獨立成篇，是方豪依據

⁹ 許叔平，《蘭苕館外史》，卷 9，頁 10b。

¹⁰ 方豪，〈弁言〉，文叢本，頁 15。

其他版本而從〈海上紀略〉中析出。至於所謂「他本」，應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當年所藏的《渡海輿記》。

因此，根據上述討論，應有兩個問題值得討論，一是在郁永河原稿中，〈字內形勢〉有無獨立成篇；另一問題是，〈字內形勢〉有無附圖？以下先討論有無獨立成篇的問題。

（一）〈字內形勢〉是否獨立成篇？

1. 未成篇的刊本：屑玉叢譚本與趙達綸本

方豪所說的屑玉叢譚本係指光緒初年錢徵與蔡爾康編輯「屑玉叢譚叢書」時，收入了《裨海紀遊》，編者蔡爾康為《裨海紀遊》正文、〈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偽鄭逸事〉各作一篇跋文，其中並無〈字內形勢〉，顯見此一版本之〈字內形勢〉並未獨立成篇，而是附見於〈海上紀略〉。由於屑玉叢譚本中收錄有趙達綸刻本之序，方豪當時未見此一刻本，惟推斷屑玉叢譚本祖述趙達綸刻本。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有趙達綸刻本，封面書名為「裨海紀遊」，另有「道光乙未新鐫」、「棗花軒主人訂」等字樣，並附〈偽鄭逸事〉、〈番境補遺〉、〈海上紀略〉等三篇，¹¹ 有序文一篇，引述如下：

余筮仕秦中……然公餘之暇，輒披卷以當臥遊，適於破篋中檢及裨海紀遊一冊，是余幼時於琉璃廠故紙堆中搜索得之者。原題武林郁永河撰，而郁君之為人、行事無可稽考。……付之梓人，表郁君之志……襄平達綸序。¹²

達綸即趙達綸，許奉恩誤謂姓達，此人乃民國初年主修《清史》之趙爾巽祖父。趙達綸自述於北京琉璃廠購得《裨海紀遊》一冊，可能是抄本，但題作「武林郁永河」，武林乃杭州之另稱。此書有〈字內形勢〉，惟未獨立成篇，文末有〈海域圖〉。

¹¹ 郁永河，《裨海紀遊》，道光趙達綸刻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地 832 / 855。版本形式為一頁 10 行，每行 20 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有「北京圖書館藏」之朱文藏書印，以下引用本書一律簡稱為「趙達綸刻本」。

¹² 趙達綸刻本，頁 1a-2b。

另外，光緒年間刊行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裨海紀遊》與 1924 年（大正 13）連橫刊印的《裨海紀遊》，〈字內形勢〉亦未獨立成篇，均屬於趙達綸刻本的形式，但未有圖。

2. 獨立成篇的版本：昭代叢書本與周于仁刻本

在趙達綸刊刻《裨海紀遊》之前二年，即 1833 年（道光 13），有楊復吉輯，沈懋德校跋的「昭代叢書」刊本，在該叢書戊集收錄《裨海紀遊》一卷，另有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一卷與之相鄰。沈懋德跋文謂：「後附〈字內形勢〉一篇，〈海上紀畧〉數則，亦復簡雅不支，蓋與《海國聞見錄》雅相伯仲云」，署年是癸巳，即 1833 年。¹³ 此一刊本的〈字內形勢〉一篇，起自「天宇外涵，大地虛懸於中」，結以琉球條：「相戒不往」；其後再接〈海上紀畧〉。¹⁴

至於《渡海輿記》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刊本，由周于仁刊刻於 1732 年（雍正 10）。據方豪記載，臺灣大學的前身臺北帝國大學於 1928 年（昭和 3）收藏一部《渡海輿記》鈔本，方豪在其合校足本中亦參考此鈔本，但未見原刊本。¹⁵ 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此一刊本，以下據此刊本討論。此書有周于仁序，謂於福建省永春知縣任內，自幕友袁翻皇處獲得抄本，「余讀之，條分縷晰，……爰付之梓，以與天下之未得觀海者共覽焉。惜作記者姓氏不傳。」此書後於周于仁調任將樂知縣時刊刻。全書除〈渡海輿記〉一篇外，另有〈番境補遺〉、〈海上紀畧〉、〈字內形勢〉、〈臺郡番境歌〉等篇。¹⁶

此外，又有 1843 年（道光 23）鄭光祖輯刻的舟車所至本《採硫日記》，有〈番境補遺〉、〈海上紀畧〉，無〈字內形勢〉一篇，亦未附入〈海上紀畧〉，不過此一版本自謂是「節錄武陵郁滄浪原本」。¹⁷ 粵雅堂叢書本《採硫日記》有 1853 年（咸豐 3）伍崇曜跋文，謂出自「吳中吳翊鳳伊仲祕籍叢函鈔本，不著撰人名氏」，僅

¹³ 轉引自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1697 年原刊），頁 301。成文出版社此一刊本附錄七種《裨海紀遊》版本，分別是方豪合校足本《裨海紀遊》、市村榮傳抄本《渡海輿記》、昭代叢書本、舟車所至本、粵雅堂叢書本、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臺灣詩蒼本等。此書以下簡稱「成文本」。

¹⁴ 〈字內形勢〉，成文本，頁 274-282。

¹⁵ 成文本，頁 19-20。

¹⁶ 郁永河，《渡海輿記》，1732 年刻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索書號：/01770/ 史·地理·外紀。

¹⁷ 舟車所至本《採硫日記》，成文本，頁 303-346。

刊出記載採疏過程的三卷。¹⁸ 這兩種都是節錄較多的刊本，對於本文討論〈海上紀略〉與〈宇內形勢〉的關係，較不具討論價值。

上述各種版本中，《渡海輿記》年代最早，刊於1732年，昭代叢書本與趙達綸刻本刊刻時間相當，都刊於1830年代，由於年代最早的《渡海輿記》裡，〈宇內形勢〉是獨立成篇，也許可以視為是早期的型態；另一種編輯形式，則是未獨立成篇。方豪編輯文叢本時，雖以趙達綸刻本為依據，卻將〈宇內形勢〉自〈海上紀略〉中析出，應是依循《渡海輿記》的編輯形式。

表一 《裨海紀遊》相關篇章對照表

版本		〈宇內形勢〉 獨立成篇	〈宇內形勢〉 併入〈海上紀略〉	附篇順序	備註
1732年 周于仁刊本《渡 海輿記》	原刊本 臺北帝 大抄本	√		番境補遺、海上紀略、 宇內形勢、臺郡番境歌	
1833年 昭代叢書本		√		宇內形勢、海上紀略	
1835年 趙達綸刊本			√	偽鄭逸事、番境補遺、 海上紀略	1878年 屑玉叢譚本 重刻此刊本
光緒 小方壺齋叢鈔本			√	番境補遺、海上紀略	
1924年 連橫刊本			√	番境補遺、海上紀略	
1950年 方豪合校足本		√		番境補遺、宇內形勢、 海上紀略、鄭氏逸事	
1959年 文獻叢刊本		√		鄭氏逸事、番境補遺、 海上紀略、宇內形勢	

製表：陳宗仁

(二) 〈宇內形勢〉有無附圖？

各種版本裡，不論〈宇內形勢〉是否獨立成篇，〈宇內形勢〉的文字大略相同，意味著十八世紀以來《裨海紀遊》以鈔本、刊本流傳時，此篇的內容大致相同，但若論有無附圖時，各種版本間卻出現有、無的差異。

¹⁸ 粵雅堂叢書本《採疏日記》，成文本，頁347-464；伍崇曜，〈跋文〉，成文本，頁463-464。

現存趙達繪刻本有〈海域圖〉，此即許奉恩所見之刻本，而在〈字內形勢〉最末有段文字值得注意，謂：

以余所知諸國繪為圖，俾覽者知其形勢，以驗盆中水石之喻而已。¹⁹

在其餘各刊本裡，此段文字中的「繪為圖」三字均作「略為說」，雍正年間的《渡海輿記》即已如此。

因此，筆者認為郁永河有關渡海採硫的著作中，除了本事之外，另有幾個附篇，目前雖未發見郁永河的手稿或由其親自刊刻的版本，但從現存由他人抄寫、刊刻的版本來看，各版本篇章、內容大致相同，其間文字差異、內容刪減比較像是抄寫或編排所造成。本文討論的〈字內形勢〉一文，最初是否獨立成篇，難以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雍正年間的刻本已有此文，且各版本差異不大。至於〈海域圖〉是後人所加，或郁永河原稿即有？就現存版本來看，並無法確定，至多只能追溯至 1830 年代的趙達繪刻本。

以下討論圖像本身，亦即〈海域圖〉的圖像形式與內容是否有著時代印記，能否說明圖像產生的年代？

三、圖像的分析：內容與主題

許奉恩《蘭苕館外史》所附地圖，作者自謂是依據趙達繪刻本，由於筆者已覓見此一刻本，以下即依據此一刻本之圖討論。首先討論〈海域圖〉的形式。

在趙達繪刻本中，圖未題名，置於〈字內形勢〉之後，在第 80 頁，其後接〈暴風日期〉。²⁰ 圖框線外有方位標記，上為「正東」，下為「正西」，右為「正南」，左為「正北」。為何是上東、下西？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傳統的〈華夷圖〉是上北下南；明代之海防圖，是上東下西，與〈海域圖〉相同，但兩者呈現的概念並不相同，海防圖主要是從陸地看海洋，是陸上官兵防禦海上倭盜，故

¹⁹ 趙達繪刻本，頁 79。

²⁰ 《蘭苕館外史》之圖未與〈字內形勢〉一文相鄰，而是置於擷錄的〈海上紀略〉最末。可見抄寫之不易遵循原樣。

陸地在下，而海洋與島嶼在上；至於〈海域圖〉的上東、下西，筆者認為應是東、西洋概念的呈現，關於此點，以下還會討論。

〈海域圖〉之圖框內，其符號可分為線條與文字兩類。線條作為一種符號，可以再分為兩類，一類是地域描繪，如陸地、島嶼的形狀，另一類線條代表航線，沿襲傳統針路圖的表現方式。至於圖中文字，可細分為三類：一類是表現地名，如臺灣、漳州府、英圭黎等；第二類是說明航線距離，如「廈至東京七十更」、「咬啣至萬丹四十更」、「澎湖至臺五更」等；第三類是地理說明，詳見下文討論。

由於圖形描繪與圖中文字彼此有相關性，合併討論如下：

（一）矩形陸地的描繪與文字說明

圖中央偏下，有一橫置之矩形陸地，即今中國大陸與中南半島。中國大陸海岸線呈現大致水平之橫線，向圖右側（南向）延伸；在文字部分，由北而南（即由左至右），依序標出沿海地名、江名：「遼東、天津衛、登州府、萊州府、江南安東縣黃河入海、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寧波府、台州府、溫州府、福寧州、²¹福州府、興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廣東潮州府、瓊州、厓州、²²岡州」。載錄的地名基本上以沿海各省之府名為主，其中，瓊州、崖州及岡州被置於中國大陸沿岸，而瓊州之旁，有一海島，只寫一「府」字，此島應為瓊州府；明清之際，瓊州府下轄三州，即儋州、萬州與崖州，清代因之，故知排列在最後的「岡州」，可能是「萬州」之訛誤，萬州在海南島南側，為船隻航經處。²³

中南半島像是圓形半島，其地名依序有：「東京、交趾、占城、東浦寨、暹羅、六崑、大年、柔佛、麻六甲」。矩形陸地的內陸，標注有「緬甸」、「雲南省」，顯示繪圖者認為，緬甸鄰近清朝的雲南省。在雲南省之東，有廣西省，往北有貴州省、四川省、陝西省，在陝西省下方，有一說明文字，謂：「陝西、四川、貴

²¹ 福寧州，《蘭苕館外史》之引文誤作福寧府。按：1473年（成化9），福寧縣升為福寧州（直隸州），至1734年（雍正12），升為福寧府，參見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卷143，頁2019，雍正12年5月辛卯條載：「福寧地當衝要，崇山峻嶺。向設直隸州，不足以資彈壓，請改為福寧府」。

²² 厓州即崖州，厓字為俗體。以下行文使用崖字，引文則依原件寫法。

²³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73載：獨珠山「在萬州東南海中……南國諸番修貢，水道視此為準，其洋為獨珠洋……十更，取交趾洋。」顯示萬州海域為當時中國沿海船隻前往越南海域必經航道。

州之西皆山，山外皆部落，回回及各藏之地，去海尚遠；至海便是西海矣，中國陸路不通，不能見海。」顯示繪圖者的方位感相當正確，即中國西南去海尚遠，但是可以通西海，即今印度洋。此處地理空間不是用圖形呈現，而是以文字表達。

（二）島嶼地域及其交通網絡的描繪

在此圖左上方有朝鮮、日本、琉球三個地域，與圖框相連，看不出是半島或島嶼，而圖下方的英圭黎〔按：指印度〕、啞齊（Aceh，在蘇門答臘島北側）、咬啣叭，²⁴ 亦未繪出完整邊界，在繪圖者設定的空間中，這些地域是邊界，因此未繪出其完整圖像。另外，對於英圭黎以西的地域空間亦同樣以文字表達，而非用圖形呈現，即圖的左下角有五行文字，謂：

紅毛即荷蘭國，又在英圭黎之西北，西洋又在荷蘭之西北，海道甚遠，中國舟航不能到，圖中亦不能載。²⁵

在圖最下側（即西方），在圖框旁有一行文字延伸至圖最右側，其文謂：

北〔其〕山甚大、甚遠，自咬啣起，迤邐而南，越南海萬里，不知所極，又迴環轉東萬里，歷馬神、文萊、蘇祿，轉北直至呂宋止。據沿海而論，已數萬里，至於入山深遠，未可測識，較中國地似更大矣。²⁶

上述兩段文字有「舟航不能到」、「未可測識」、「不知所極」等語，均是「圖中亦不能載」之意，意即這些空間只以文字描述。因此，本圖的空間可以區分為三類概念：中心、海域、及未繪出。矩形陸地是本圖的中心空間，而圖的上方、右方、下方都有邊界，在中心與邊界之間則是由海洋、島嶼及大陸沿岸構成的海域空間；此外，「回回及各藏之地」是圖幅內未繪出的空間，而咬啣叭以南、英

²⁴ 咬啣叭，即今印尼首都雅加達（Jakarta），十九世紀以前，中國沿海商人依據雅加達的馬來語舊稱（Kelapa），譯寫為「咬啣叭」，或其他讀音相近的譯名，如「噶喇吧」、「咖囉吧」。以下行文使用「咬啣叭」一詞，引文則依原件寫法。

²⁵ 〈海域圖〉，趙達繪刻本，頁 80。

²⁶ 按：「其山甚大」之其，原圖寫作「北」，但〈字內形勢〉作「其」，「北山」應為「其山」之誤。參見〈海域圖〉，趙達繪刻本，頁 80。

圭黎以西亦屬未繪出的空間，但位於圖幅外。

圖面各處地域存在著關連性，以圖畫描繪而言，地域間有互相連結的線條，代表航線；以文字寫作而言，則是說明某地到某地有多少更數水程。明末張燮有一段文字討論針路，有助於解讀此圖航線的繪製方式，張燮在《東西洋考》的〈凡例〉中謂：

舶人舊有航海針經……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為鎔成一片，沿途直敘；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輒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敘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²⁷

文中所謂「正路」即指東洋針路或西洋針路而言，「迂路」則指從正路「輒入某國」；就此圖之航路而言，亦可見到正路與迂路的分別，如廈門至麻六甲的航線中，有線條歧出至大年或柔佛，後二者的航路即所謂迂路者。

在這些相連貫的地域與航線裡，筆者認為可以區分為以三個地點（港口）為中心的地域群，分述如下：

1. 以廈門為中心的地域群

在此圖中，廈門位在中心處偏左側，在漳州府與泉州府外海，這是全圖多處航線中最重要之起始點，與其有關的島嶼地域群、航線甚多。如：

- (a) 廈門至日本：「廈至日本七十二更」。
- (b) 廈門至澎湖、臺灣：「廈至澎湖七更」、「澎湖至臺五更」。
- (c) 廈門至菲律賓群島：「廈至呂宋七十二更」、「廈至蘇祿一百四十更」。
- (d) 廈門至中南半島：「廈至交阯七十二更」、「廈至暹羅一百八十更」。
- (e) 廈門至麻六甲海峽：「廈至麻六二百四十更」。〔按：麻六即麻六甲。〕
- (f) 廈門至爪哇島：「廈至蛟二百八十更」。〔按：蛟指咬啣叭。〕

²⁷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20。

2. 以咬啣叭為中心點的地域群

- (a) 咬啣叭至萬丹 (Banten, 在爪哇島西側)：「咬啣至萬丹四十更」。〔按：咬啣叭均少一「叭」字，下兩條同。〕
- (b) 咬啣叭至馬神 (Banjarmasin, 在加里曼丹島南側)：「咬啣至馬神一百四十更」。
- (c) 咬啣叭至啞齊：「咬啣至啞齊三十更」。

3. 以寧波為中心點的地域群

- (a) 寧波至日本：「寧波至日本三十五更」

在此圖中，從某地起始到某地的句型以及線條的繪法均表明廈門、咬啣叭及寧波都是航路的起始點，但以廈門最重要，其航線指向圖中大部分的港口，遍及日本、臺灣、菲律賓、中南半島、蘇門答臘、爪哇等地，應是顯示廈門在圖面空間中的重要性，亦即廈門位於唐人²⁸ 在東、西洋貿易的中心位置。至於咬啣叭的航線指向蘇門答臘島的啞齊、爪哇島的萬丹、加里曼丹島的馬神，顯示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在的巴達維亞（咬啣叭）是印尼群島的貿易、交通重心，也是唐人在此區域活動的據點。至於寧波港，只說明是前往日本，²⁹ 寧波的重要性顯然遠不如前面二港。

許奉恩閱讀此圖，在圖旁註明觀感，謂：「海內外各處朗若列眉，梯航者觀之，亦可知所考焉」，³⁰ 他認為〈海域圖〉的描繪是從梯航者的角度著眼，亦即如上文所述，透過空間的安排與線條的連貫，使海內外各處空間及其相互關係清楚可見，猶如現代習見的捷運、公車路線圖。不過這「梯航者」指的是誰？上文提到，〈海域圖〉中有三處主要港口：廈門、咬啣叭及寧波，三者在此圖幅中的重

²⁸ 本文使用的「唐人」一語，指十七、十八世紀在東亞海域活動的中國沿海居民，主要為閩、粵兩地之人，有些學者稱之為華人。

²⁹ 此處之日本，指長崎港，朱德蘭有專文討論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中、日間的海洋貿易活動，指出交易品主要是銅與絲織品，至於中國沿海主要貿易港有上海、蘇州、寧波、舟山、福州及廈門，參見朱德蘭，〈清開海令後的中日臺灣長崎貿易商與國內沿岸貿易 (1684-1722)〉，收於張炎憲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三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頁 369-415。另外，劉序楓則指出十八世紀清朝海商在長崎的貿易勢力，初期福建商人勢盛，但漸為江蘇、浙江商人取代，參見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6 (1988年1月)，頁 133-161。

³⁰ 許叔平，《蘭苕館外史》，頁 41a。

要性依序遞減，何以如此？咬喇叭是十七、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的首要據點，對荷蘭人而言，咬喇叭的重要性必然超過廈門；同樣的，對寧波商人來講，寧波必然是最重要的港口，是他們前往日本、臺灣、中國沿海南北各港口的起始點。因此，對於廈門重要性的表達，反映的是某地「梯航者」的角度，而此處的「梯航者」應指廈門（閩南）商人、水手。

（三）與航行有關的描繪

圖中地名，有一類既非行政區或港口、國名，而是與航行有關的地名，如圖中右側的「大崑崙、小崑崙、寧盤山、東竹、西竹、將軍帽」、往呂宋、蘇祿一帶的「大、小二覆釜山、文武樓山、呂蒙山」、以及中國沿海的「南澳、金門、舟山、沙門島、皮島」等。

大、小崑崙在今越南南端海上，即 Pulo Condore；³¹ 寧盤山，應為芋盤山，又作地盤山、茶盤山，即 Pulau Tioman，在馬來半島彭亨港外海；東、西竹即 Pulau Aur，在茶盤山的東南方海域；將軍帽即丁宜（Tinggi）島，在茶盤山西南側海域。³² 陳國棟曾為文指出這些島嶼自宋、元以來，即是海上航行途中的轉折點，³³ 如《海國聞見錄》謂：「茶盤一島，居崑崙之南，毗於萬古屢山之東；皆南洋總路水程分途處」。³⁴

至於在東洋針路上，如「大、小二覆釜山」，應在呂宋島北側之島嶼，〈宇內形勢〉中載：「往呂宋者，……循臺灣南沙馬磯……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遶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指正南，水程一百四十更。」³⁵ 意即大、小覆釜山為航路之分岔點。文武樓山在民都洛（Mindolo）島附近；³⁶ 呂

³¹ 東、西兩島對峙，西大東小，故有大、小崑崙之稱，參見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51。陳倫炯著、夏璣淵圖，《海國聞見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29謂：「崑崙介各洋四通之所」。

³² 汪大淵著、蘇繼廣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228-229。

³³ 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13-14。

³⁴ 陳倫炯著、夏璣淵圖，《海國聞見錄》，頁21。

³⁵ 趙達倫刻本，頁78。

³⁶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183載：「又從呂宋，過文武樓，沿山至龍隱大山，為以寧港。」按：該書點校者謝方謂指今菲律賓的民都洛（Mindolo）島西北部的曼布勞（Mamburao），參見同書，頁265。

蓬，又寫作呂蓬山、呂帆、呂蒙山，即今菲律賓的盧邦（Lubang）島。³⁷

中國沿海幾個島嶼亦皆為航行指標，如沙門等五島，今稱廟島群島，位在渤海與黃海交匯處；皮島位在鴨綠江口以東。³⁸

上述這些島嶼均是重要的航行指標、航線分岔點。

另有「氣（南澳氣）」、「萬里長沙」兩處地名雖非航行指標，亦與海上航行有關，意指危險海域。如圖中之「氣」，應指南澳氣，即今之東沙群島海域，據《海國聞見錄》載：

南澳氣，居南澳之東南。嶼小而平，四面挂腳，皆巉岨石。底生水草，長丈餘。灣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則吸攔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為落濤。³⁹

至於萬里長沙，在海南島之南，越南東海岸，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之《海錄校釋》中載：「萬里長沙者，海中浮沙也，長數千里，為安南外屏……船誤入其中，必為沙所涌，不能復行，多破壞者」。⁴⁰

航行指標或是危險的沙汕海域都是海上航行必須熟知的地理知識，這類訊息通常見於針路簿，〈海域圖〉引用這些地名，顯示此圖的內容來源與當時的航行知識密切相關。⁴¹

四、〈字內形勢〉的分析

前已述及，在趙達繪刻本中，〈海域圖〉是接於〈字內形勢〉一文之後。上節討論了〈海域圖〉的空間結構與內容，本節接著討論〈字內形勢〉此篇文字，

³⁷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273。

³⁸ 〈海域圖〉載：「沙門島皮島等五島」，此語似誤，沙門島在山東半島外海，皮島在鴨綠江口，所謂五島應指沙門、鼈機、牽牛、大竹、小竹等五島，即今廟島群島，參見王士性著、呂景琳校，《廣志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57。

³⁹ 陳倫炯著、夏璇淵圖，《海國聞見錄》，頁 31。

⁴⁰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127。又頁 19-22，校釋者安京有專文討論萬里長沙之位置，可參看。

⁴¹ 此外，〈海域圖〉在東南側將軍帽島附近，記載「海舟過此不見北斗矣」，北斗星與導航有關，亦屬航行知識。

以見兩者的異同。〈宇內形勢〉全文約二千字，與《裨海紀遊》其他條目相比，是一篇較長且完整的文章。全文格式乃舊式體例，並無標點區分段落，筆者試為分段，以下引述趙達綸刻本之文字（參見附錄二，不另加注），並敘其文章結構與大意如下：

1. 首段概論

首段起自「天宇外涵，大地虛懸於中」，至「東南半壁又皆海也」一語。主旨首先說明地圓說，即「古以卵為喻」、「天地之體，既皆圓矣」，在此觀念下，對傳統兩種說法質疑，一是鄒衍所謂九州之外又有大海環遶，作者認為其說誇大不經。⁴² 二是清朝人所居之「中華大國」，既非大，亦未在天地之中，作者認為北極才是「天地之中」，而中國偏在東南。⁴³

2. 中國與海域的關係

次段起自「自遼陽為中國東北極際」，終於「未嘗達雲南也」。主旨介紹中國東面、南面之海域形勢；自北而南，縷述行政區、港口門戶、沿海島嶼及相鄰的少數民族。全段又可分為三小段：

(1) 中國東面海域

從遼陽到廈門，其敘述的重點有：天津、山東一帶有沙門等五島，「與遼陽、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此入海」；崇明、上海「為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寧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為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之香剎在焉」；沙城是浙閩之交；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泉、漳間有金門、廈門二山，「各廣數百里，商舶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

上述文字裡，黃河入海口是在「江北安東縣」，但〈海域圖〉寫作「江南安東縣」。清初安東縣，今稱漣水縣，位在江蘇省北部。⁴⁴ 就地理位置而言，安東縣位

⁴² 司馬遷，《新校本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74〈孟子荀卿列傳〉，頁2344載：「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郁永河之觀點與《史記》前述文字頗類似。

⁴³ 周翔鶴即據上述說法，論證郁永河已受到明末耶穌會士如利瑪竇等的地理概念影響。

⁴⁴ 安東縣境原為淮河出海口。明朝時黃河分成南、北二流入海，其中南流入淮河水道，弘治年間築塞

在江北，故可稱「江北安東縣」，但〈海域圖〉寫作「江南安東縣」，此江南應指清初新設的江南省而言。⁴⁵

最末一段亦值得重視，即廈門是商舶通往外洋的出入口。另外，1687年（康熙26）於舟山群島設縣，⁴⁶即前文所謂「今為定海縣」，可見此文寫作時間必在設縣後。

(2) 中國南面海域

本文記載此一海域時，不同版本間文字、文意差異甚大。趙達綸刻本載：

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粵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為瓊，瓊之南為厓、為崗，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東面已盡，瓊、厓之間，實為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為中國之南面矣。

方豪校本載：

漳與粵之潮郡接壤，自遼東至此，中國東面已盡；地勢緣海轉西，故粵有海角亭，實大地之東南隅也。此處海中有山曰南澳，南澳以西為廣州之香山澳，為厓門；次惠州；次高州，高州海外有碣洲；次雷州，雷州渡海為瓊州；雷之西為廉州，自潮郡至廉約五千餘里，皆南面臨海，海至廉州而止。⁴⁷

上引兩段文字不同，而且不是局部文字增多或刪改而已，似曾經改寫，已是文意變動。方豪在其校本中，亦注意到這兩種不同的寫法，他選擇採行昭代叢書本的文字。1959年方豪編輯文叢本時，雖以趙達綸刻本為母本，⁴⁸但此處文字仍照1950年時的看法，依循昭代叢書本。

北流，安東縣境遂為黃、淮二河出海口，至清初猶然。參見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520；吳緝華，〈明代劉大夏的治河與黃河改道〉，收於吳緝華，《明代社會經濟史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頁351-370。

⁴⁵ 1645年（順治2）清軍攻陷南京城後，設置江南省。從康熙初期起，江南省分設為安徽、江蘇二省，但分省過程一直到乾隆、嘉慶年間才逐步完成。關於江南設省與分省的問題可參看以下二文：姜濤，〈清代江南省分治問題立足於《清實錄》的考察〉，《清史研究》2（2009年5月），頁14-22；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7:1（2002年3月），頁75-84。

⁴⁶ 崑岡等修、劉啟瑞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啟文出版社，1963），頁5442。

⁴⁷ 成文本，頁104。

⁴⁸ 文叢本，頁15。

這兩段文字最大差異是中國東面海域究竟止於何處？方豪校本（昭代叢書本）謂止於閩粵之間的漳、潮兩府，地勢自此轉西；但周于仁刻本的《渡海輿記》與趙達綸刻本的文字相同，謂中國東面止於瓊州、崖州，即今海南島，亦即中國海岸線究竟是在漳、潮一帶轉西，或在海南島轉西？這是兩者歧異處。值得注意的是，〈海域圖〉的畫法與趙達綸刻本之寫法相同，而與昭代叢書本有異。

再就文字內容來論，方豪校本所述地名相對位置有兩處可疑，一是「地勢緣海轉西，故粵有海角亭，實大地之東南隅也」，此句會讓人誤以為海角亭位在漳州、潮州一帶，因這個版本謂海於此轉西，故海角亭才可能在東南隅；但實際上，海角亭似指廉州之海角亭，《海國聞見錄》載：「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為限……是以亭建『海角』於廉……」；⁴⁹ 其次，謂惠州在廣州與高州之間，亦誤，廣州府與高州府之間是肇慶府，惠州則在廣州府之東，與潮州府相鄰。

至於趙達綸刻本所載惠州位於潮州與香山之間，位置正確，但謂瓊州之南為崖、為崗。〔按：崗字恐為萬字之誤，見前節所述。〕

(3) 中國西南陸域

本文對此一陸域的記載，版本間亦有差異。趙達綸刻本載：

粵東地而西，為粵西，更西為貴州省，又更西為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南盡處，不盡於海，而盡於山，崇山複嶂，猺獠苗夷所居，又有緬甸國，皆瘴癘害人，人不能入，而海港亦僅止於粵西之某郡，未嘗達雲南也。

方豪校本載：

廉之西為粵西省，更西為貴州省，又更西為雲南省；雲南者，中國之西南隅也。然粵西、雲南之南，不盡於海，而盡於山。此山迤邐而南，為交趾、占城、暹羅諸國。⁵⁰

兩版本間文字有異，但文意大致相同。後者文字較精簡，刪去了「崇山複嶂，

⁴⁹ 陳倫炯著、夏璇淵圖，《海國聞見錄》，頁5。

⁵⁰ 成文本，頁104。

猓猓苗夷所居」，似由前者改寫而成。不過敘述的視點不同，方豪校本強調雲南之南不盡於海，是從陸地看海的觀點；而趙達綸刻本則著重海港僅止於某郡，是從海看陸地的角度。

3. 與中國相連的海域

本段起自「自瓊、厓間渡海港而南」，止於「實未嘗渡海也」，主旨敘述中南半島（含馬來半島）的港口、國家，按地理位置不同，又可分為三組：

- (a) 中南半島東側：有「東京、安南」，即今越南，亦是船隻從海南島往西南航行最先抵達的區域。
- (b) 中南半島南側：柬埔寨、暹羅。
- (c) 馬來半島諸港：六崑、大年、柔佛、麻六甲。

此段文字呈現兩種敘述方式，一是與航行知識有關，如方位是依「海舶」由廈門往南，從海南島的瓊州至暹羅是由北而南，而「麻六甲為西面盡處」；此外亦記明廈門至各處的水程，如至麻六甲二百更。

另一種敘述方式是以中國為主體，強調這些國家「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棄而不收」；又謂「至此〔按：指麻六甲〕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這些文字背後均暗寓著中國大陸的存在與船隻未遠離大陸沿海。

4. 以咬啣叭為中心的海域

本段文字起自「自麻六甲斜指西北」，止於「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又可分為兩小段：

(1) 從咬啣叭往西北海域的描述

前一段強調廈門至麻六甲止，是沿山航行，並未真正渡海，從麻六甲至咬啣叭，則是「始渡西海」。從咬啣叭往西北是啞齊，「啞齊之外，中國舟航不能往。」相傳尚有英圭黎、荷蘭、大西洋等國，「皆在西海外」。這些傳聞的國家裡，本文對英圭黎有較多的敘述，謂此國又稱「英雞立」，應即 English 之譯音；敘述此國

物產有「哆囉呢、畢吱、西洋布、嘉紋席、玻璃器皿」，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強調，這些物品「與咬啣叭等，而皆優於咬啣叭」。

(2) 從咬啣叭往南、往東海域的描述

此段文字先謂咬啣叭「其山最大又最遠」，其山指爪哇島而言。自咬啣叭往南則是萬丹（Banten）；「又極南萬里為馬神」，馬神即 Banjarmasin，在加里曼丹島南側。萬丹與馬神「皆產胡椒、蘇木、沉速、珈楠諸香」。

從加里曼丹島南側的馬神「轉東」，描述加里曼丹島往北至呂宋島之間的島嶼，其文謂：

迤北為文萊（一無所產，極貧、極陋）、為蘇祿（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光澤，中國人名為淺水珠）、為呂蒙山。至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為文武樓山，以迄呂宋。

接著描述前往此一海域的航路及「故迂其途」的緣故：

海舶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叭，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迂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

文中的南海水道應指從呂宋島往蘇祿以南至馬神海域的航路，所謂「水道未諳」乃指唐人船隻不慣常走此一路線。筆者認為唐人水手、商人對此陌生的原因，與他們當時最常前往咬啣叭有關；咬啣叭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的主要據點，由此往東前往歐洲人所稱的香料群島，此一路線應視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來到東亞海域後，慣常航行的路線。換言之，水道未諳的緣故，非因航行的自然條件，而是唐人在咬啣叭取得這些地域的商品以及以咬啣叭為據點，前往這些地域，而無須從蘇祿群島再往南。故水道未諳，是不熟悉，而非不知道。

5. 東洋海域

上述第三、四項指稱的海域是張燮《東西洋考》中所說的西洋，而本段文字敘述呂宋、日本、臺灣、澎湖，即張燮書中所說的東洋，分述如下：

(1) 呂宋

本段文字先敘述廈門前往呂宋、蘇祿的航路；其次，描述咬啣叭與呂宋間的海域，即水道不諳之處：

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南巽方，經謝昆昆山、大小覆釜山，遶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指正南，水程一百四十更。

計自咬啣叭從西北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海道，遠過倍蓰。惜其割裂分據，不能統一，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

(2) 日本與朝鮮

日本者，古倭夷國，在中國正東。自其南言之，去中國甚遠，由寧波渡海，水程三十五更；北接朝鮮。朝鮮去遼陽密邇，既渡鴨綠，便可馳驛而往，與中國在斷續間，雖謂之連屬亦可。

此段文字描述前往日本的兩條路線，一是由寧波渡海，另一是經遼陽、朝鮮前往。此處作者的空間感值得注意，因為他認為與陸路相較，從海路到日本，「去中國甚遠」。

(3) 臺灣與澎湖

臺灣叢爾拳石，南北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去廈門水程十一更。中間又有澎湖為泊宿地，所處在東南五達之海，東西南北，惟意之適，實海上諸國必爭之地也。

在周于仁刻本《渡海輿記》中，有一條臺灣的記載：

臺灣（原注：複見）南北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去廈門水程十一更。中有澎湖為泊宿地，處東南四達之海，東西南北，惟意之適，實海疆要地也。⁵¹

⁵¹ 郁永河，《渡海輿記》，1732年刻本，頁28b-29a。

原「五達之海」改為「四達之海」，郁氏原稿也許是作「四達之海」。又「海上諸國必爭之地」改為「實海疆要地也」。

(4) 大西洋與紅毛

接下來一小段文字略顯突兀，作者談論唐人商舶未至的地域，即荷蘭與大西洋，先引述如下：

以上諸國，皆有商舶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舶不過至咬喇叭而止。咬喇叭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守土，不知者目為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驚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

本段文字先述唐人商舶往來的諸國，如日本、咬喇叭等，其山川、道里等訊息皆能得悉，但荷蘭與大西洋遠在西海外，故此處對荷蘭、紅毛、大西洋的描述得之傳聞，有令人費解者，如謂：「近歲呂宋為紅毛所據……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或謂「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在《裨海紀遊》另有〈紅夷〉、〈西洋國〉兩條，亦有類似的說法，如〈紅夷〉條載：

紅毛即荷蘭國，又曰紅夷，一名波斯胡，亦在西海外，實大西洋附庸也。⁵²

〈西洋國〉條則載：

余謂紅毛密邇西洋，自是同類，英圭黎、咬喇叭皆西洋小國，宜為兼并，不足深怪；獨怪呂宋在東海外，遠過中國萬里，亦為所踞，此其心寧有厭足乎？⁵³

此段文字謂紅毛兼併英圭黎、咬喇叭、呂宋。

至於西洋或大西洋所指何國，似不甚確定。〈西洋國〉條載：

⁵² 成文本，頁 116。

⁵³ 成文本，頁 119。

西洋國在西海外，去中國極遠。其人坳目隆準，狀類紅毛。……又有利馬豆者，能過目成誦，終身不忘。……又歲運白金鉅萬至香山澳，轉送各省郡邑天主堂，資其所用。⁵⁴

文中的「利馬豆」，即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如果他是西洋國人，則西洋國可能指義大利；但上文又謂歲運白銀至香山澳（即澳門），澳門屬葡萄牙管轄，如此則西洋國似指葡萄牙；若謂紅毛是其附庸，當時歐洲似無「西洋國」這樣的強國。這些描述均傳聞之詞。

(5) 琉球

琉球在東海日本之南、呂宋之北，去中國不遠。以其貧甚，故商賈蹙額視之，相戒不往。

此段內容可與《裨海紀遊》中的〈琉球〉條對看，該條載：「琉球國在閩省正東，去中國最近。然最小弱，又最貧，商舶從無貿易琉球者，以其貧且陋也。……憶吾鄉俗語謂厭憎之物，輒曰『琉球貨』。陋劣不自今日始，古語已云然矣。」⁵⁵ 兩者所述重點大致相同，只是前者較精簡，而後者文字較多，且有作者自述鄉俗之語。

6. 結語

主要有兩段意思，先引述如下：

以余所知諸國繪為圖，俾覽者知其形勢，以驗盆中水石之喻而已。若夫騶子終始大聖之篇，所謂大瀛海者，渺不可稽，存而不論可也。

前段交代另有圖繪，「俾覽者知其形勢」。「盆中水石之喻」則是重述全文開端所謂：「四夷八荒各占一區，如盆盎中貯水石然」；至於後段評騶衍，亦與全文開端之語意相同。結語之寫法並無新意，只是使全文有頭、有尾，補足文章的完整性。

⁵⁴ 成文本，頁 118。

⁵⁵ 成文本，頁 114。

筆者依〈字內形勢〉文意，分為六段，其中前言與結語寫天宇、大地及海的關係，另外四段分別是：

- (2) 中國與海域的關係
- (3) 與中國相連的海域
- (4) 以咬啣叭為中心的海域
- (5) 東洋海域

這四段文字共同的敘事主體是中國，由近而遠，先述中國臨海府縣、島嶼，接述與中國相連的中南半島港口、國家，最後敘述與中國不相連的兩處海域；這些海域又可分為唐人船隻往來與不往來兩種，啞齊以西，即蘇門答臘島以西的海域是唐人船隻不通航的區域。至於在通航的海域中，有些地點是區域性的中心，如中國沿海的廈門、西洋的咬啣叭、東洋的呂宋等。

五、圖與文呈現的年代、知識脈絡及地理想像

本文想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郁永河《裨海紀遊》相關文字裡，是否有一張〈海域圖〉？另一個問題是，〈海域圖〉存在於什麼樣的歷史時空中，或者反映了什麼樣的時空狀況。前者是版本考證的問題，已如上文所述，而後者是時代性的問題，分別討論如下：

（一）圖與文的寫作年代

《裨海紀遊》一書，如前所述，在不同版本間，內容有異同，編排方式亦不一致，但大部分的版本是沒有附圖的，僅有近年周翔鶴注意到《蘭苕館外史》引用之圖，見於1835年的趙達綸刻本，但此時已是郁永河來臺百餘年後，純就《裨海紀遊》原書有無附圖此點而論，這是一個孤證，且年代較遠，證據力較弱。

除了版本依據外，另一種判別方式，是檢討現存〈海域圖〉與《裨海紀遊》書中其他文字的關係，特別是〈字內形勢〉一文與圖的關係。如果〈海域圖〉與《裨海紀遊》的某些內容有著明顯的相關性，那麼此圖與郁永河文稿的關係則多

一佐證。

本文在前述兩節分別討論〈海域圖〉與〈宇內形勢〉的內容與敘事結構，筆者認為兩者具有極明確的相關性。從敘事內容來看，兩者記載的地名幾乎相同，相關各港的航行更數亦相同，航線所經的指標島嶼亦相同，甚至有相同的錯誤，如萬州誤作崗（岡）州，詳細內容已見上文分析。

從敘事的結構來看，兩者敘事的主體都是中國，雖然作者知道「吾人所居所謂中華大國」已非天地之中，但中國仍是論述的基礎視點。如〈宇內形勢〉的文字內容是由近而遠，先敘述中國沿海府縣、港口，再敘述西洋各處港口、國家、物產，最後描寫東洋海域；而圖像內容亦是以中國大陸之陸塊為中心，周圍畫出各處港口、國家，並以線條連結相關各港，強調不同航線間各自的連結網絡。

此外，《裨海紀遊》的〈海上紀略〉收錄了日本、琉球、西洋國、紅夷等記載，與〈宇內形勢〉相較，兩處文字相似而不同，這種現象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文稿是同一作者先後寫成，故文意相似，但內容繁簡不一；另一種可能是有兩位作者，各自所寫文稿被併抄於《裨海紀遊》一書。然而以對臺灣的描述為例，《裨海紀遊》的正文與〈宇內形勢〉均談到臺灣是「當四達之海」，為「海上諸國必爭之地」，對於這種文字與概念的雷同、相似，筆者認為應是同一作者所寫。

本文第二節根據現存版本，指出各版本有一明顯差異，即〈宇內形勢〉獨立成篇或併入〈海上紀略〉，但〈宇內形勢〉此文至少已見於 1732 年刊本，因此，郁永河原稿中包含〈宇內形勢〉應無疑義。另外，雖然無法從版本的角度，論斷附圖與否，但〈海域圖〉與《裨海紀遊》的內容有明確的相關性，似可遵照周翔鶴之見解，稱之為〈宇內形勢圖〉。〔按：在下文討論中，改用此一稱呼。〕

〈宇內形勢圖〉與〈宇內形勢〉是同一種地理知識體系在文字與圖像上的呈現。就中國傳統的寫作形式來說，這是一種圖說、圖誌，余定國在討論中國方志地圖時，引述十九世紀《廣平府志·凡例》所載：「事非圖不顯，圖非說不明」，指出地圖與文字說明互補，此種形式在明清方志中相當常見。⁵⁶

再從文本呈現的年代來看，郁永河在 1697 年來臺採硫，其有關臺灣的遊記應寫於此年之後，而前節分析〈宇內形勢〉時，提及此文稱舟山群島「今為定海

⁵⁶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81-82。

縣」，此點透露寫作時間離 1687 年設縣不會太久，而舟山設縣後 10 年，即郁永河來臺。另外，〈宇內形勢圖〉中有「天津衛」一詞，此衛設於 1404 年（明永樂 2），於 1725 年（雍正 3）改衛為州，⁵⁷ 故此圖描述之年代應在 1725 年之前。

根據上述討論，筆者認為《裨海紀遊》包含〈宇內形勢〉之文與地圖，寫作年代在 1697 年前後或十八世紀初，可以視為是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作品。然而郁永河的文稿在抄錄、刊刻過程中，文字有訛誤，甚至被改寫，地圖被刪去。至於改編者是誰？可能郁永河自己也改寫過文稿，但原著地圖在後來刊印時被刪去，此種例子屢見不鮮，如本文引述的許奉恩《蘭苕館外史》，在光緒年間的刻本如中央研究院所藏者，即未見地圖；康熙年間杜臻的《粵閩巡視紀略》亦有附圖，在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孔氏嶽雪樓影鈔本中，圖亦未附。⁵⁸ 但《裨海紀遊》地圖被刪去，與上述二書的情形略有不同，上述二書的文字尚提及有圖，圖是被抄寫或刊刻者忽略了；《裨海紀遊》未附圖的版本中，已將〈宇內形勢〉文中「以余所知諸國繪為圖」，改為「以余所知諸國略為說」，這是省去地圖的同時，還修改相關文字。

（二）圖與文的知識脈絡

郁永河是否描繪〈宇內形勢圖〉，此事涉及郁永河及《裨海紀遊》一書的價值與重要性，但在此一問題之外，〈宇內形勢〉的圖與文畢竟流傳至今，這兩種文本已有獨自的價值，它們表達出什麼樣的知識、概念？這是相對於《裨海紀遊》版本考證之外，另一個獨立存在且重要的課題。

就文本性質而言，〈宇內形勢〉類似針路簿，但又有不同，針路簿如《順風相送》或《東西洋考》卷九〈舟師考〉所引述，其內容著重山形、水勢的描寫，以及更數、針位的記載，屬於船隻水手實踐性的知識，《裨海紀遊》書中收錄〈暴風日期〉、〈海上占晴雨〉等資料，⁵⁹ 亦屬此類知識。但〈宇內形勢〉雖有方位、更數記載，卻更著重港市、國家、物產等，故兩者內容並不相同。只是〈宇內形勢〉的圖與文依據的知識卻與針路簿一樣，均源於唐人（閩南商人、水手）在東、

⁵⁷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 30，頁 445，雍正 3 年 3 月乙巳條。

⁵⁸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83）。

⁵⁹ 趙達綸刻本，頁 81-84。

西洋航線的活動與主觀體驗，〈宇內形勢〉的圖與文引用了此類知識，重新編寫，將之書面文字化與圖像化。⁶⁰

以下再論〈宇內形勢圖〉的畫法。此圖畫法類似鄭和航海圖或明末之海防圖。⁶¹ 鄭和航海圖著重港口位置與海岸地形的描繪，至於海防圖則是為了防禦海上盜寇入侵而繪，故亦重視沿海港灣、島嶼的描寫。兩者繪法類似，但目的不同。清初與之類似的地圖尚有杜臻《粵閩巡視紀略》所附的〈廣東沿海總圖〉與〈福建沿海總圖〉，⁶² 稍晚又有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所附〈沿海全圖〉，⁶³ 但〈宇內形勢圖〉與這些地圖的性質並不相同，且比例尺差異甚大。

從圖幅比例尺大小的角度來看，〈宇內形勢圖〉較類似宋代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明代鄭若曾的〈輿地全圖〉或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⁶⁴ 它想表達的是大範圍的、人類所知的全域。利瑪竇編製的地圖有長方形圖與圓形圖，描繪整個地球；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的〈四海總圖〉，即西方地圖傳統中的東半球圖，⁶⁵ 但〈宇內形勢圖〉與此不同，它的全域概念較接近〈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輿地全圖〉，仍是中國傳統的世界觀，這類地圖試圖描繪華、夷的存在感與彼此的相對關係，如十七世紀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裡的〈皇明大一統地圖〉，即屬此類地圖，在圖中，其南方畫出整片水域，並標注一些國名，如滿喇加、暹羅、三佛齊等。⁶⁶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紀中葉鄭若曾編製的〈輿地全圖〉（見附錄一），此一地圖的方位東上西下，其繪法應與海防圖有關，但比例尺變小，沿岸島嶼、港灣的形貌被忽略，在中國海岸線之外，出現新羅、日本、琉球、小琉球等島嶼，其南

⁶⁰ 近年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發現的 The Selden Map，其海域的描繪概念，亦有與〈宇內形勢圖〉類似者，將另文討論。

⁶¹ 參見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北京：中華書局，2000）；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3。

⁶²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2a-13b。

⁶³ 陳倫炯著、夏燮淵圖，《海國聞見錄》，頁 36-69。

⁶⁴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上海：該社，1989），據日本東洋文庫藏宋西川成都市西俞家刻本影印，頁 6-7；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頁 2-3；黃時鑿、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所附圖。

⁶⁵ 陳倫炯著、夏燮淵圖，《海國聞見錄》，頁 34-35。

⁶⁶ 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收於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頁 1213-1217。

方則是陸地，即中國大陸西側與中南半島之緬甸等地。這種形式的畫法，可以視為是傳統華夷圖與明末海防圖兩種繪圖形式的混合。

筆者認為〈宇內形勢圖〉之繪法乃是從鄭若曾〈輿地全圖〉之類地圖演變而來，〈宇內形勢圖〉上半部的繪法與鄭若曾〈輿地全圖〉上半部相似，只是圖面焦點由日本轉移至廈門與臺灣一帶；至於〈宇內形勢圖〉下半部亦是使用相同的繪圖手法，將唐商、水手對於今東南亞海域知識，以圖像方式畫出。至於〈宇內形勢圖〉有無受到歐洲地圖的影響？十七世紀歐洲地圖的繪製依循天文學的觀測（astronomical observation），有經緯度，注重比例控制，但從〈宇內形勢圖〉對大陸、島嶼形狀的描繪來看，仍甚粗略，似無參考某一歐洲地圖的跡象，惟此點仍有待更細緻的探討。⁶⁷

因此，就繪圖的形式而言，〈宇內形勢圖〉的繪法可以視為十六世紀以來華夷圖系與海防圖系的融合與發展；其內容來自航行知識，而結合輿圖內容與形式的，則是東、西兩洋的架構。

東洋、西洋、北洋、南洋等用語常見於宋、元以來的中國海洋文獻，學者對此討論甚多，不贅述。⁶⁸ 本文所謂「東、西兩洋」是沿用張燮《東西洋考》一書的概念，張燮在卷九〈舟師考〉中將民間舶人「舊有航海針經」，「鑄成一片，沿途直敘」時，把相關針路歸納為「西洋針路」與「東洋針路」，並提出「正路」與「迂路」的說法。但東、西兩洋的概念並非張燮獨創，原先為航行用語，在1560年代漳州月港商船獲准出洋通番後，逐漸成為官方用語，如官方有關水餉徵收的規定，即依「東洋船」、「西洋船」〔按：指船隻航往東洋，則稱東洋船，西洋船

⁶⁷ 筆者有兩篇論文分別討論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地圖對於臺灣島及其周遭海域的描繪，其風格與〈宇內形勢圖〉差異甚大，參見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2（2003年12月），頁249-278；陳宗仁，〈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41（2008年6月），頁111-166。

⁶⁸ 邱炫煜，《明帝國與南海諸蕃國關係的演變》（臺北：蘭臺出版社，1995），頁19-33；劉迎勝，〈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收於南京鄭和研究会編，《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頁120-133；陳佳榮〈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收於南京鄭和研究会編，《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6-145；何鳳瑤，〈東西洋的界域和演變〉，《上海大學學報》5（1994年5月），頁78-81；宮崎市定，〈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據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7:4（1942年8月），頁197-218。

亦同〕分別徵稅。⁶⁹

當時閩南商人的航行針路被整理成兩類針路時，其實透露著東、西洋針路各自構成一個通商網絡，亦即閩南的商人、水手及文人是以前大洋的概念來理解海外世界，於是東、西洋概念又成為海洋地理知識的用語。因此，1610 年代周起元在為《東西洋考》寫序時謂：「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剗餘鯨，分市東、西路」；⁷⁰ 或是十七世紀中葉楊英《從征實錄》中載：

因先年我洋船到後，紅夷每多留難，本藩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臺灣通商。⁷¹

這些文獻顯示「東、西洋」、「東、西路」、「東、西夷國」等概念流行於十六世紀下半葉、十七世紀，不僅是航行用語，而且用來指稱當時唐人在東亞海域活動範圍。學者對此時期唐人在東、西洋活動的研究甚多，如田汝康、林仁川、張彬村、包樂史（Leonard Blussé）、劉序楓、普塔克（Roderich Ptak）對此均有專文探討，⁷² 近年卜正明（Timothy Brook）則提出“*The South China Sea World-Economy*”的說法，可參看。⁷³

筆者認為，〈字內形勢〉的圖與文亦有西洋針路、東洋針路的分別，其敘述方式均使用東、西兩洋的架構，而這種架構與十七世紀初的《東西洋考》相同。

⁶⁹ 張變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140-145。有關月港商船出洋制度之形成，可參見陳宗仁，〈晚明「月港開禁」的敘事與實際：兼論通商船、徵商稅與福建軍情之轉變〉，收於湯熙永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頁 101-142。

⁷⁰ 張變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 17。

⁷¹ 楊英，《從征實錄》（文叢第 32 種，1958；1666 年原刊），頁 113。

⁷² 田汝康，〈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航運和商業上的地位〉、〈再論十七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業的發展〉，二文收於田汝康，《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 1-34、35-52；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包樂史著，莊國土、吳龍、張曉寧譯，莊國土審校，《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張彬村，〈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華人的商業勢力發展〉，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頁 329-360；劉序楓，〈由《華夷變態》看清初東亞海域的海上交通情況：以船隻的往來和人員的移動為中心（1674-1728）〉，收於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32-56；普塔克，〈1600-1750 年前後的華南港口和亞洲海上貿易〉，收於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一輯）》，頁 241-256。

⁷³ 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25-229.

在〈字內形勢圖〉中，中國海岸線構成一條橫線，將圖幅分隔成上、下兩半，此線上側是東方海域，下側是西方海域，即東洋與西洋。圖中橫線往右延伸，即到文萊，而在《東西洋考》中謂：「文萊國即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所自起處也」。⁷⁴

（三）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地緣政治想像

〈字內形勢〉的圖與文雖沿襲十六世紀下半葉以來有關東、西兩洋的架構，但其敘事的內容卻反映新時代變化，顯現閩南人士對於十七、十八世紀之際東亞海域地緣政治的認識。1684年（康熙23）清朝採行「開海貿易」政策，⁷⁵中國東南沿海地域與東亞海域各港的貿易在清朝與明鄭對峙時期受到抑壓，此時復歸興盛。張彬村曾討論此一開海政策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三個立即而明顯的影響」，分別是唐人到長崎貿易的增加、唐人到巴達維亞貿易的增加、歐洲公司到中國貿易的展開；他認為前兩項影響使荷蘭東印度公司不願直接派船到中國貿易，因為荷蘭人在巴達維亞即可取得中國商品，而英、法、丹麥等國的公司則無此條件，仍必須派船航往中國沿海港口。⁷⁶張彬村前述看法是為了解釋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再派船到中國的原因，但亦描述了清朝開海政策實施後，各股海上貿易勢力如唐商、各歐洲公司的應對，〈字內形勢〉的圖與文即反映此一形勢，分述如下：

1. 被放大的臺灣與澎湖

上文提及〈字內形勢〉的圖與文，其敘事主體都是中國，郁永和是杭州人，在福建擔任福州府海防同知幕僚，以中國的角度敘述，應是自然之事。但《裨海

⁷⁴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184。關於文萊在唐人針路中的重要性，可以參看陳國棟，〈談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以婆羅洲汶萊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主辦，「第十屆海洋史國際研討會」，2006年8月25-26日。

⁷⁵ 關於海禁的施行、解除經過及解除原因，可參見陳國棟，〈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貿易的形成〉，收於陳國棟，《東亞海域一千年》，頁258-274；劉鳳雲，〈清康熙朝的禁海、開海與禁止南洋貿易〉，收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56-70。至於清朝前期的對外貿易政策，可參見劉序楓，〈十七、八世紀の中國と東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貿易政策を中心に〉，收於溝口雄三等編，《地域システム》（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頁87-129。

⁷⁶ 張彬村，〈十七世紀末荷蘭東印度公司為甚麼不再派船到中國來？〉，收於劉序楓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頁169-190。

紀遊》中有「我朝聲施遠被，偽鄭歸誠」，「我朝定鼎，四方賓服」等語，⁷⁷ 則郁永河不僅是閩浙沿海之人，在閩浙沿海活動，自身亦有「我朝」的感覺。而與「我朝」聲勢有關的是「偽鄭歸誠」，此事即涉及臺灣。

〈字內形勢〉的圖與文反映的是閩南人士對海域世界的觀看，廈門是東、西洋航線的起點，而與廈門鄰近的海外地域，以臺灣島最重要。在〈字內形勢圖〉中，廈門位在全圖中央偏左，其上方即澎湖與臺灣，臺、澎兩島的島形比例明顯比其他島嶼大，澎湖群島的比例又更突出，說明這兩地在繪圖者的心目中，似較他島重要。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有關臺灣的敘述，亦強調臺灣的重要性。他描寫北臺採硫經歷後，認為「既來海外……可不為一言，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⁷⁸ 於是描述臺灣的山川、形勢，並謂：臺灣「為賈販通外洋諸國，則財用不匱。民富土沃，又當四達之海」，又謂：「今既有其地，而謂當棄之，則琉球、日本、紅毛、安南、東京諸國必據之矣！」⁷⁹ 此即〈字內形勢〉文中所謂「海上諸國必爭」之意。在廈門觀點的圖繪與文字中，何以突顯臺灣與澎湖的重要性？廈門在清初開海後的重要性，可參見吳振強（Ng Chin-Keong）專著。⁸⁰ 除了與東亞海域各港貿易外，在行政管轄上，設立「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並規定廈門是與臺灣對渡的正口，使得廈門與臺、澎的關係，在貿易之外，更具有軍事、行政上的密切關聯。道光年間刊行的《廈門志》尚謂廈門是「海疆要隘，渡臺、通洋正口」、「南通諸番，東控臺灣」。⁸¹ 因此，臺灣、澎湖在輿圖中被放大描繪，反映的是康熙中、後期的臺、廈時局與形勢。

鄧津華（Emma J. Teng）在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論中國輿圖對於臺灣的描繪，他依循〈禹貢圖〉、〈大明一統之圖〉等輿圖史料的分析，主張明朝與清初官方認為臺灣島是海外偏遠的蠻荒之地，⁸² 但他可能忽略了明末清初海防、海域輿圖對臺灣的描繪，低估清初官方與民間對臺灣的認識。〈字內形勢〉圖與文對臺灣的描繪與誇大是一個例證，顯示福建官紳對於臺灣的認識與重視。

⁷⁷ 成文本，頁 33、43。

⁷⁸ 趙達倫刻本，頁 32a。

⁷⁹ 成文本，頁 69-70。

⁸⁰ Ng Chin-Keong,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⁸¹ 周凱，《廈門志》（文叢第 95 種，1961；1839 年原刊），頁 13、305。

⁸² Emma Jinhua Teng,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6-59.

2. 咬啣叭與呂宋

咬啣叭即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位於爪哇島西北側。1610年代張燮《東西洋考》卷三載〈西洋列國考〉，首列下港，附見加留吧。⁸³ 下港又稱萬丹(Bantam)港，在十六世紀時是胡椒集散地，十七世紀初，荷、英東印度公司均在此設立據點，張燮書中謂下港有紅毛番此設立土庫，此外又有佛郎機人(葡萄牙人)在此設立據點，「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而且「下港為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⁸⁴ 顯見下港是東南亞區域性的貿易中心，而此時「加留吧，下港屬國也」。但是161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咬啣叭，命名為「Batavia(巴達維亞)」，此一港口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的總部，萬丹港在海域貿易的地位漸被咬啣叭取代。⁸⁵

張彬村有專文探討唐人商業網絡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共生與互補關係，指出咬啣叭對於唐人的重要性。他認為從十七世紀後期荷蘭東印度公司逐漸擴張對爪哇島及周邊島嶼的領土控制，巴達維亞(咬啣叭)總部轉變成政府型態。東印度公司透過經營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批發和財稅收入以支持龐大的開支，至於小規模的進出口貿易、零售和稅務代理的利潤則吸引眾多的唐人投入經營。唐人不僅經營中國沿海港口與咬啣叭間的貿易，亦以咬啣叭為中心，在公司統治範圍內經商、包稅。⁸⁶ 在〈字內形勢〉的圖與文中，均強調咬啣叭的中心性與重要性，萬丹港的地位已不如咬啣叭，加上〈海上紀略〉中有「紅夷」一則，凡此均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的重要性顯露在當時唐人的意識與文字裡。

呂宋的重要性主要與1570年代西班牙人佔領馬尼拉有關，由於西班牙人帶來美洲白銀，成為東亞海域重要的買家；對唐人而言，呂宋(馬尼拉港)成為十六世紀下半葉東洋航路重要的貿易據點。雖然十七世紀中葉以後，西班牙在東亞的勢力消退，購買力漸衰，但呂宋仍是東洋海域中的主要貿易港，⁸⁷ 在〈字內形

⁸³ 參見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41、44，惟同書，頁179，加留吧作「咖啣吧」。

⁸⁴ 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頁48。

⁸⁵ 有關萬丹的商業貿易及其與巴達維亞地位的更替，參見曹永和，〈明末華人在爪哇萬丹的活動〉，收於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233-271。

⁸⁶ 張彬村，〈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華人的商業勢力發展〉，頁329-360。

⁸⁷ 筆者曾以西班牙失去或放棄雞籠、淡水據點為例，說明西班牙王國在東亞勢力的衰退，參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265-300。

勢〉中，呂宋是由大西洋國統治，〈海上紀略〉中亦有「西洋國」一則，謂「閩人多有逐利呂宋者」。⁸⁸

在〈字內形勢〉中，咬啣叭與呂宋是西洋與東洋航路的中心點，但這兩地不能僅視為兩個地名或港口而已，而是代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西班牙王國在東亞海域的勢力，這兩股勢力是東亞海域最主要的政經力量。1716年（康熙55），康熙皇帝亦注意到：

海外有呂宋、噶喇吧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代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臺灣之人時與呂宋地方人、互相往來、亦須預為措置。⁸⁹

次年清朝兵部會同廣東將軍、閩浙總督、兩廣總督商議：「凡商船照舊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噶囉吧等處，不許商船前往貿易。」⁹⁰ 1718年（康熙57）原任碣石總兵官陳昂條奏：

臣詳察海上日本、暹羅、廣南、噶囉吧、呂宋諸國形勢。東海惟日本為大，其次則琉球。西則暹羅為最。東南番族最多，如文萊等數十國，盡皆小邦，惟噶囉吧、呂宋、最強。噶囉吧為紅毛市泊之所，呂宋為西洋市泊之所。而紅毛一種、奸宄莫測，其中有英圭黎、干絲蠟、和蘭西、荷蘭、大小西洋各國，名目雖殊，氣類則一。⁹¹

這幾條 1710 年代的史料均顯示呂宋與咬啣叭在當時東南亞海上貿易中的重要性，⁹² 對清朝官方而言，也許應稱為危險性，康熙皇帝才會要求兵部會同閩粵兩地總督商議，禁絕商船前往貿易，以免成為「海賊之藪」。

⁸⁸ 成文本，頁 119。

⁸⁹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卷 270，頁 2597-2598，康熙 55 年 10 月壬子條。

⁹⁰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71，頁 3609，康熙 56 年 1 月庚辰條。

⁹¹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77，頁 3698-3699，康熙 57 年 2 月丁亥條。

⁹² 藍鼎元亦謂：「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囉吧為大，文萊、蘇祿……等數十國皆渺小」，參見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收於藍鼎元著，蔣炳釗、王鈿點校，《鹿洲全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頁 54。

3. 英圭黎的寓意

在〈字內形勢圖〉中，啞齊的北方，沿著航線延伸到英圭黎，此一英圭黎是咬啣叭與呂宋兩股勢力外，另一股新興而值得重視的商業勢力。在陳倫炯《海國聞見錄》中，英圭黎是指現今歐洲之英國，⁹³ 但〈字內形勢圖〉中，英圭黎卻鄰近啞齊，啞齊在蘇門答臘島，與歐洲相距甚遠，故知鄰近啞齊之英圭黎應指現在的印度而言。當時印度半島是由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 1526-1858）統治，十七世紀以來，英、法及荷蘭均在印度沿岸建立商業據點，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據點是馬德拉斯（Madras）、孟買（Bombay）及加爾各答（Calcutta）；其中，馬德拉斯位在印度半島東南岸（coast of Coromandel），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往東亞海域發展的主要據點，⁹⁴ 在《海國聞見錄》中，寫作「網礁臘，係英圭黎埔頭」。⁹⁵

清初 60 年間，英國船隻（包含公司船與散商船）在中國沿海最主要的交易港口是廈門，⁹⁶ 由於這些英國船隻都是從印度的英國據點發出，⁹⁷ 在〈字內形勢圖〉中，英圭黎被「誤」置於啞齊的西北海域，應是廈門商人對於英國商人及其船隻來源地的「認識（誤識）」。在〈字內形勢〉中，敘述英圭黎物產有「哆囉呢、嗶嘰、西洋布、嘉紋席、玻璃器皿」，並強調這些物品「皆優於咬啣叭」，此一敘述似乎隱寓著，在東亞海域裡，咬啣叭與呂宋之外，似乎有新的商業勢力—英國東印度公司崛起，英國商業力量已受到福建海商注意。

根據以上討論，〈字內形勢〉圖與文的重要性，在於反映康熙「開海」後東亞海域的貿易狀態與形勢，〈字內形勢圖〉應視作一幅商業角度的海域圖，描繪的是東、西兩洋，包含中國、中南半島、馬來半島、日本、臺灣、菲律賓群島、

⁹³ 陳倫炯著、夏璇淵圖，《海國聞見錄》，頁 27 載：「英圭黎一國，懸三島於吝因〔按：指瑞典〕、黃旗〔按：指丹麥〕、荷蘭、佛蘭西四國之外海」。

⁹⁴ K. N.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1-53, 98.

⁹⁵ 陳倫炯著、夏璇淵圖，《海國聞見錄》，頁 23。

⁹⁶ 蕭致治、楊衛東編撰，《西風拂夕陽：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03-105。

⁹⁷ 馬士著，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頁 41-64、125-132、144-152，記載英國商人在 1683-1715 年間在廈門的商業活動；松浦章，〈清代前期中英海運貿易研究〉，收於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三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頁 228-248。〔按：此文整理《華夷變態》有關英國船隻在中國沿海貿易的訊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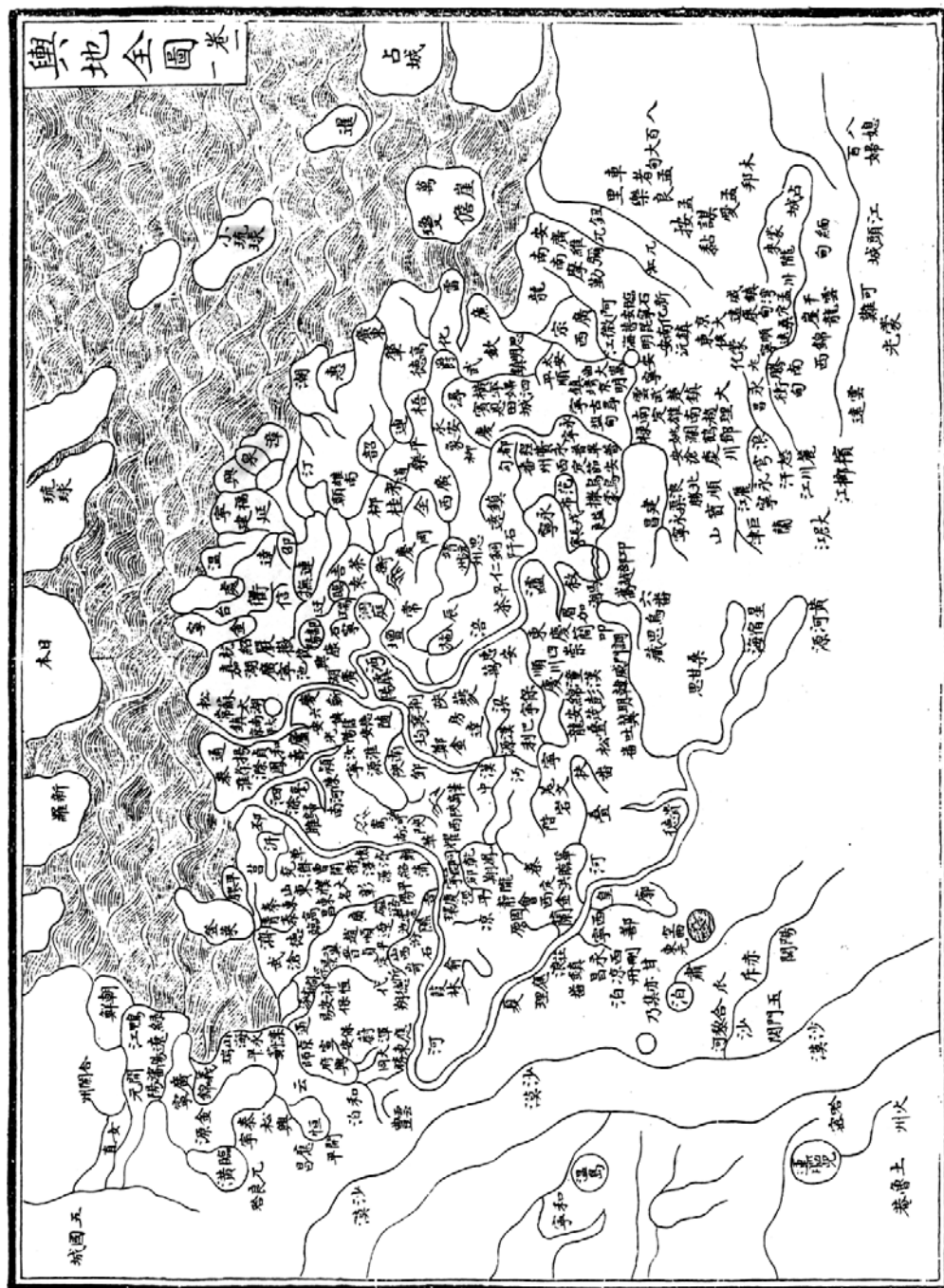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亞群島等地的沿海地域，這些都是當時相當商業化的區域。然而，在這兩份中文文本中，卻也寄寓了清朝中國、荷蘭、西班牙、英國等幾股勢力的存在，亦即〈字內形勢〉圖與文刻畫了十七、十八世紀之際東亞海域的地緣政治結構，是唐人（以廈門為中心）與歐洲勢力（咬啣叭、呂宋、英圭黎）的反映，而原有伊斯蘭與各地土著貿易勢力則不是論述之重點與內容。

六、結論

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主要記述自身來臺見聞，近代學者的研究亦著重郁永河對清初臺灣社會的觀察，特別是有關平埔族群的記載，但此書另有〈海上紀略〉、〈字內形勢〉等篇描述郁永河所知的東亞海域情勢，較少受到學界重視。周翔鶴在《蘭苕館外史》書中「找到」一幅地圖，這幅與《裨海紀遊》有關的地圖引起一些問題，促使我們重新關注《裨海紀遊》的版本與文本內容，方豪當年之合校足本應視為《裨海紀遊》文本研究的基礎而非結論，本文僅討論〈字內形勢〉圖與文的版本問題，對郁永河文稿更完整的討論應俟諸他日；其次，郁永河除了描述來臺的見聞之外，在書中亦有相當篇幅敘述清初的東亞海域世界，他的觀察角度與內容亦值得關注。

依據本文的討論，晚清文獻裡的〈字內形勢圖〉究竟是不是郁永河《裨海紀遊》相關文稿的一部分？由於現今《裨海紀遊》各版本均非郁永河自己刊刻，亦無自序，嚴格而論，目前所見之各刻本、抄本僅是聲稱為郁永河的文稿；但各刻本、抄本的篇章大致相同，內容近似，應同出一源，即源自郁永河原始的手稿，包含〈字內形勢〉、〈紅夷〉諸條目均是。至於〈字內形勢圖〉雖僅見於單一刻本，但從文本內容與敘事結構來看，〈字內形勢〉的圖與文與《裨海紀遊》相關諸稿的文字雷同或文意相似，反映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地理知識與東亞海域形勢。因此，依據〈字內形勢〉圖與文的時代性及其與郁永河諸稿的相關性，雖無法排除〈字內形勢圖〉是他人所為，但至少可以認為是郁永河同時代的作品，甚至是郁永河的作品。

本文另一個重點是討論〈字內形勢圖〉的時代性。本幅輿圖描繪閩南水手、商人從廈門前往東、西洋的水程、航路及港市，〈字內形勢〉的圖與文可以視為清朝初期商人、水手有關東亞海域知識的圖像化與文字化。然而如何描繪一個多語言、多宗教、多族群、多島嶼的海域？即使在今日，東亞海域仍是一個複雜地域，如何以一個統一的架構去簡化、描述此一海域？〈字內形勢〉的圖與文沿襲十六世紀以來的東、西洋地理知識架構，再寫入十七、十八世紀之際的新知識、新形勢，呈現了對臺灣、咬啣叭、呂宋、英圭黎等地的關注，其空間關係不是依循自然地理如潮流、季風、島群分布，亦非受限於交通技術條件，如遠近、險阻與否，而是顯現 1684 年清朝開放海禁後，閩南海商的商業運作網絡以及他們對東亞海域的認識與關注。



附錄一 輿地全圖

圖片來源：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輿海圖編》，頁2-3。

附錄二 〈宇內形勢〉⁹⁸

天宇外涵，大地虛懸於中，古以卵為喻，似近之矣。海水附隸於地，而包山川原隰者又海也。其中四夷八荒各占一區，如盆盎中貯水石然。騶衍論天地之大，如中國赤縣神州，禹之所序者纔八十一分之一，外此尚有九州。凡一州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其外，語近不經。然吾人所居，自謂中華大國，未免見大言大，不知大本無據，而中亦未然，夫天地之體既圓矣，人處宇內，頭戴天而足履地，何莫非中？若必求天地之中，則惟北極天樞之下，此處如輪之轂、如磨之臍、如人身之心，庶幾足以當之。然天樞之下，實在朔漠以北，去禹跡甚遠。中國一區，道里雖廣，若以天樞揆之，其實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

自遼陽為中國東北極際，緣海而南為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門等五島，與遼陽、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此入海；次狼山，揚子出焉；次崇明、上海，為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浙西之柘浦、海鹽；次錢塘；次寧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為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之香刹在焉；次台、溫；次沙城，為浙閩之交。過此為福寧州；次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門二山，各廣數百里，商舶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

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粵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為瓊，瓊之南為厓、為嶺，皆奧（按：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東面已盡，瓊、厓之間，實為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為中國之南面矣。

粵東地而西，為粵西，更西為貴州省，又更西為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南盡處，不盡於海，而盡於山，崇山複嶂，猺獠苗夷所居，又有緬甸國，皆瘴癘害人，人不能入。而海港亦僅止於粵西之某郡，未嘗達雲南也。

自瓊、厓間渡海港而南，水程七更抵東京（小字注：國名，本交趾也；明時，黎氏為外家所據，遂另為一國）。東京又渡海港十二更抵安南；安南，即古交趾國。東京、安南兩海港，自港口橫渡雖甚廣，漸西漸隘，而海亦止，蓋海之支汊也。故東京、交趾山川實與貴州、雲南連屬不斷；漢伏波將軍征交趾，立銅柱，不以海為限，而以分茅嶺為限，則接壤可知。交趾之南曰東浦寨，曰暹羅，曰六崑、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凡六國，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棄而不收。麻六甲為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凡海舶由廈門直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八十

⁹⁸ 郁永河，《裨海紀遊》，趙達綸刻本，頁75b-79b。

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

自麻六甲斜指西北四十更為咬啣叭（音葛臘八），始渡西海。咬啣叭西北為啞齊（產黃金，鑿石取之，其形正方，不假鎔煉。其主無嗣，以女繼統，今猶是女主）；啞齊之外，中國舟航不能往，相傳尚有英圭黎（音英雞立，產哆囉呢、畢岐、西洋布、嘉紋席、玻璃器皿，與咬啣等而皆優於咬啣叭）、荷蘭（即紅毛）、大西洋等國，皆在西海外。

其山最大又最遠，自咬啣叭綿亘而南為萬丹，又極南萬里為馬神（皆產胡椒、蘇木、沉速、珈楠諸香）。自馬神轉東，迤北為文萊（一無所產，極貧極陋）、為蘇祿（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光澤，中國人名為淺水珠）、為呂蒙山。至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為文武樓山，以迄呂宋。海舶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叭，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迂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

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南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遠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指正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計自咬啣叭從西北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海道，遠過倍蓰。惜其割裂分據，不能統一，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

日本者，古倭夷國，在中國正東。自其南言之，去中國甚遠，由寧波渡海，水程三十五更，北接朝鮮。朝鮮去遼陽密邇，既渡鴨綠，便可馳驛而往，與中國在斷續間，雖謂之連屬亦可。臺灣蕞爾拳石，南北三千里、東西三百里，去廈門水程十一更，中間又有澎湖為泊宿地，所處在東南五達之海，東西南北，惟意之適，實海上諸國必爭之地也。

以上諸國皆有商舶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舶不過至咬啣叭而止。咬啣叭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守土，不知者目為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鷙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

琉球在東海，日本之南、呂宋之北，去中國不遠，以其貧甚，故商賈蹙額視之，相戒不往。

以余所知諸國繪為圖，俾覽者知其形勢，以驗盆中水石之喻而已。若夫騶子終始大聖之篇所謂大瀛海者，渺不可稽，存而不論可也。

球

臺灣

澎湖

日本

朝鮮

五島
沙內島皮島等

鴨綠江遼東

天津衛

登州府

萊州府

江南安東縣黃河海口

揚子江

吳淞江

錢塘江

寧波府

台州府

溫州府

福州府

興化府

泉州府

漳州府

廈門

汕頭

廣東潮州府

瓊州府

崖州

廣西省 雲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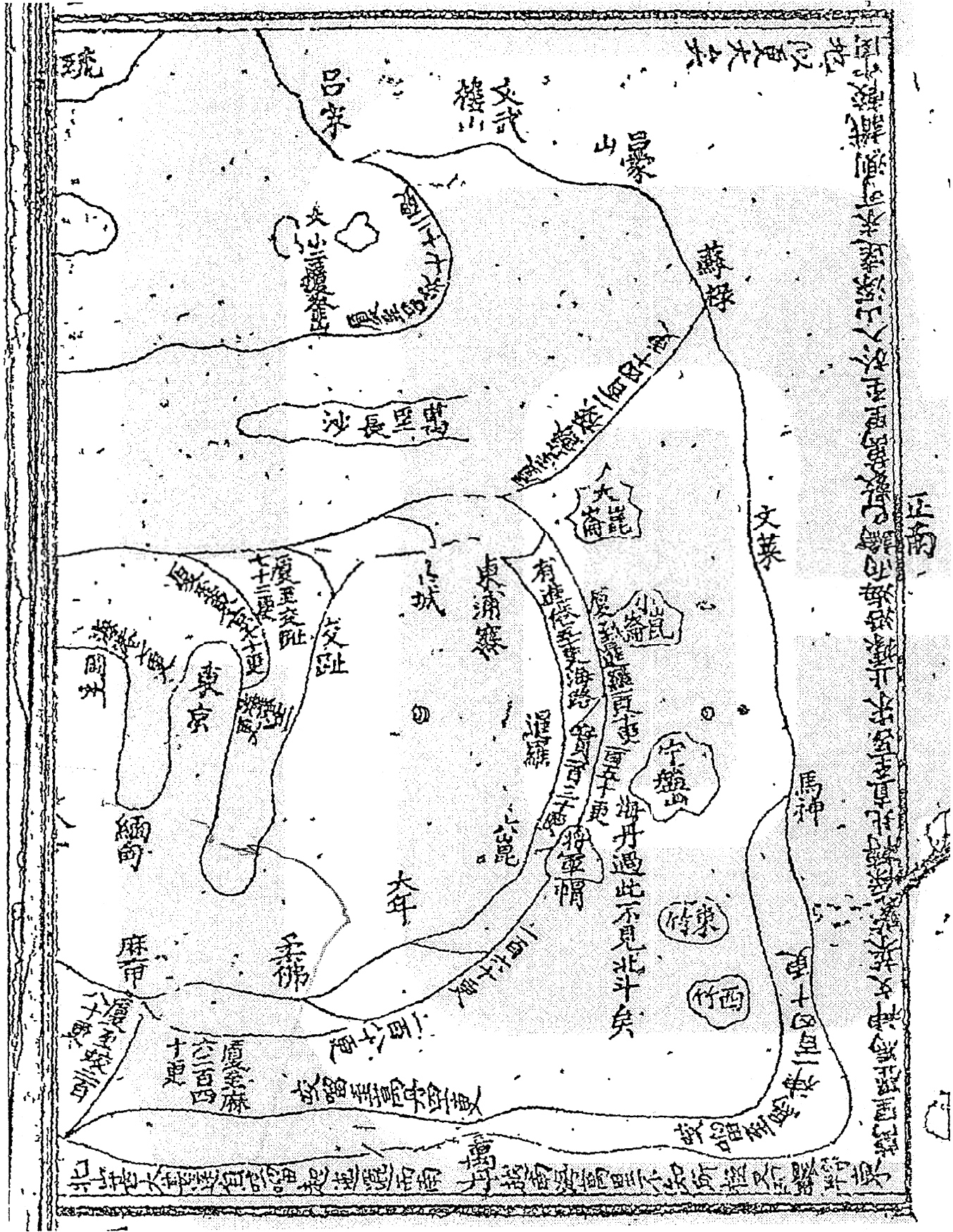
貴州省 四川省 陝西省 廣西省 雲南省

紅毛即荷蘭國又在英
至黎之西北而海又
在荷蘭之西北海道
甚遠中國舟航不能
到圖中亦不能載

英 黎

亞 齊

咬 啞 叭



附錄三 海域圖 (<字內形勢圖>)

引用書目

- 郁永河，《裨海紀遊》，道光趙達綸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地 832 / 855。
- 郁永河，《渡海輿記》，雍正 10 年（1732）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索書號：/ 01770 / 史·地理·外紀。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 1989 《宋本歷代地理指掌圖》，據日本東洋文庫藏宋西川成都市西俞家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公一兵
- 2002 〈江南分省考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7(1): 75-84。
- 方 豪
- 1950 〈郁永河及其裨海紀遊〉，《大陸雜誌》1(6): 12-17。
- 王士性（著）、呂景琳（校）
- 1981 《廣志釋》。北京：中華書局。
- 包樂史（著），庄國土、吳龍、張曉寧（譯），庄國土（審校）
- 1997 《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司馬遷
- 1979 《新校本史記》。臺北：鼎文書局。
- 田汝康
- 1987 《中國帆船貿易和對外關係史論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向 達（校注）
- 2000 《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
- 向 達（整理）
- 2000 《鄭和航海圖》。北京：中華書局。
- 朱德蘭
- 1988 〈清開海令後的中日長崎貿易商與國內沿岸貿易（1684-1722）〉，收於張炎憲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頁 369-415。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 汪大淵（著）、蘇繼頤（校釋）
- 1981 《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 何鳳瑤
- 1994 〈東西洋的界域和演變〉，《上海大學學報》5: 78-81。
-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
- 2006 《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吳緝華
- 1970 〈明代劉大夏的治河與黃河改道〉，收於吳緝華，《明代社會經濟史論叢》，頁 351-37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李金明
- 1990 《明代海外貿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偉實、許志熹

1991 〈許奉恩家世及生平考略〉，《明清小說研究》1991(4): 38+246-250。

1999 〈許奉恩評傳〉，《明清小說研究》1999(2): 234-237。

杜 臻

1973 《粵閩巡視紀略》。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粵閩巡視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

周 凱

1961(1839)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翔鶴

2010 〈從郁永河《裨海紀遊》宇內形勢圖說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六屆文化交流史暨方豪教授百年誕辰紀念：先驅、探索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5 月 15 日。

松浦章

1986 〈清代前期中英海運貿易研究〉，收於中外關係史學會編，《中外關係史譯叢（第三輯）》，頁 228-248。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林仁川

1987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邱炫煜

1995 《明帝國與南海諸蕃國關係的演變》。臺北：蘭臺出版社。

姜 濤

2009 〈清代江南省分治問題：立足於《清實錄》的考察〉，《清史研究》2: 14-22。

胡 渭（著）、鄒逸麟（整理）

2006 《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郁永河

1959(1697) 《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83 《裨海紀遊》。臺北：成文出版社。

郁永河（著）、許俊雅（校釋）

2009 《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

宮崎市定

1942 〈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據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7(4): 197-218。

馬 士（著），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區宗華（譯），林樹惠（校）

1991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崑 岡等（修）、劉啟瑞等（纂）

1963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啟文出版社。

張彬村

2005 〈十七世紀末荷蘭東印度公司為甚麼不再派船到中國來？〉，收於劉序楓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頁 169-19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08 〈荷蘭東印度公司時代華人的商業勢力發展〉，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頁 329-3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張 燮(著)、謝 方(點校)

1981 《東西洋考》。北京：中華書局。

曹永和

2000 〈明末華人在爪哇萬丹的活動〉，收於曹永和，《中國海洋史論集》，頁233-27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叔平

2003 《蘭苕館外史》。臺北：文海出版社。

陳佳榮

1996 〈鄭和航行時期的東西洋〉，收於南京鄭和研究會編，《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6-145。北京：海潮出版社。

陳宗仁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2): 249-278。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臺大歷史學報》41: 111-166。

2008 〈晚明「月港開禁」的敘事與實際：兼論通商舶、徵商稅與福建軍情之轉變〉，收於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頁101-142。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陳虹如

2000 〈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倫炯(著)、夏璇淵(圖)

1958(1730) 《海國聞見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國棟

2005 《東亞海域一千年》。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談東洋針路與西洋針路：以婆羅洲汶萊為中心〉，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主辦，「第十屆海洋史國際研討會」，2006年8月25-26日。

陳組綬

2007 《皇明職方地圖》，收於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頁1213-1217。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

普塔克

2010 〈1600-1750年前後的華南港口和亞洲海上貿易〉，收於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一輯)》，頁241-25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黃時鑒、龔纓晏

2004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楊 英

1958(1666) 《從征實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雲萍

1954 〈關於臺海使槎錄與裨海紀遊〉，《公論報》，1954年3月15日，第6版。

劉序楓

- 1988 〈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6: 133-161。
- 1993 〈十七・八世紀の中國と東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貿易政策を中心に〉，收於溝口雄三等編，《地域システム》，頁 87-129。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2010 〈由《華夷變態》看清初東亞海域的海上交通情況：以船隻的往來和人員的移動為中心（1674-1728）〉，收於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一輯）》，頁 32-5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迎勝

- 1996 〈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收於南京鄭和研究会編，《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 590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0-133。北京：海潮出版社。

劉鳳雲

- 2006 〈清康熙朝的禁海、開海與禁止南洋貿易〉，收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6-70。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

- 2007 《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

蕭致治、楊衛東（編撰）

- 2005 《西風拂夕陽：鴉片戰爭前中西關係》。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

- 2002 《海錄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

藍鼎元（著）、蔣炳釗、王鈿（點校）

- 1995 《鹿洲全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

- 1969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 1969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

Brook, Timothy 卜正明

-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udhuri, K. N. 喬杜里

- 1978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g, Chin-Keong 吳振強

- 1983 *Trade and Society: 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 1683-1735*.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Teng, Emma Jinhua 鄧津華

- 2004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patial Configuration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Yu Yong-he's Map

Tsung-jen Chen

ABSTRACT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p, documented as the work of Yu Yong-he (郁永河), was found in a nineteenth-century book. Such discovery brought up new issues concerning the authorship and content of the map. For example, is it really drawn by Yu Yong-he? Does it reveal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the early Qing Empire?

Through examin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Pi-hai Ji-you* (《裨海紀遊》) and analyzing the text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map,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ap reflects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he trade and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f East Asian Seas and offers insight into the marine geograph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oreover, the map contains both old and new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ts spatial configuration had its basis on the so-called “eastern-western ocean (東、西洋)” knowledge framework,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text was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of a new Minnan (閩南) maritime commercial network after the opening of maritime trade by the Qing Dynasty in 1684.

Keywords: Yu Yong-he, *Pi-hai Ji-you*, Commercial Network, East Asian Seas